

台北文學藝術實驗室策劃主編

【德國文學名著】

頭生

HEADBIRTH
by Gunter Grass

原著／肯特·格拉斯
譯／江福華

一九八〇年夏天，
一對德國中學教師夫婦
利用假期到亞洲旅行；
可是無論他們走到那裡，
他們始終走不出他們的國家
和自身的一些問題——
他們腦海中所浮現的問題生生不息。
就表現手法而言，
這部小說具有前衛、
實驗、原創性格。

序「當代世界文學大展」

· 閻振瀛 ·

儘管這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文學創作時代，可是我們身在此時此地的中國讀者，對整個世界文學而言，却所見不多，所知有限。原因除了我們長年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習慣於劃地自限外，我們歷史性的戰亂、貧窮，以及功利、小視、現實的價值體系，使我們無可避免地形成了這樣的遺憾。當然，我們眼前文學資訊視野不夠遼闊的最大原因是缺乏人才，更直接的原因是文學事業無利可圖，引不起人們用心用力的志願。

「臺北文學藝術實驗室」這次策劃主編「當代世界文學大展」，便是針對救濟我們國人不幸的文學際遇而來，希望透過展示當代世

界的文學精華，來壯闊我們的胸懷，鼓舞我們的追求，豐富我們的人生，提升我們的生命情境，溝通人類的心靈。

「當代世界文學大展」這系列的叢書，就創作時間而言，「當代」一詞是指最近十多年來出版的名著；就空間來說，「世界」二字原本無所不包，但是我們特別強調我們常見的世界文學之外的文學；也就是說，我們要把展示的範圍超越我們平日常見的一般歐美主要國家的文學，擴大到那些少見的國家或民族的文學。可見「當代世界文學大展」有其極特殊的「新」度與「鮮」度，這是這個出版計畫最大的特色和貢獻！

另外我們要特別告慰於讀者的，是我們策劃、選書、翻譯、審稿、校訂、出版的作業程序異常嚴謹；從事實際翻譯的工作羣，陣容也十分堅強，個個都是修讀外國文學出身，並且大多數擁有碩士

以上的教育程度；因此，呈現在中文讀者眼前的譯本，應該值得信賴。

我們不可能生存於「過去」，也不可能生存於「未來」，我們永遠生存於「當代」；因此，「當代世界文學大展」將源源不斷地譯介「當代」的世界文學名著。我們情不自禁地要說：「生活在此時此地的中文讀者開始有福了，祇要具備閱讀的興趣，就有權利欣賞當代的世界文學，並且無遠弗屆！」謹序。

閻振瀛

序於「臺北文學藝術實驗室」

作者簡介——

作者 Günter Grass，其父為德國人，其母為波蘭人，一九二七年出生於 Danzig，為戰後最負盛名的德國文學家；表現手法清新，奇特，作品充滿諷刺與批判。他多才多藝，除小說創作之外，亦擅長詩、戲劇、繪畫、雕塑等。他重要的小說作品還有 *The Tin Drum*, *Dog Years*, *Local Anaesthetic*, *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 *The Flounder*, *The Meeting at Telgte* 等。



TLAL

臺北文學藝術實驗室

Taipei Lab for Art and Literature

閻振瀛策劃主編

(美國楊百翰大學哲學博士 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所長暨英文系主任)

編審委員以筆劃爲序

- 丁善雄 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副教授
丁履謙 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 美國密蘇里大學訪問教授
任世雍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成功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何欣 國立政治大學西洋語文系教授
李志夫 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李本題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李雪琴 文化大學英文系教授
李慕白 美國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 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教授
沈斯瑩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教育博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周林靜 國家哲學博士 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胡明珽 文學碩士 中央通訊社編譯處處長
馬忠良 美國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教育博士 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徐盛華 文學碩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講師
張振玉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陳瑞山 美國愛荷華大學文學碩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講師
陳智慧 文學碩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講師
黃美序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哲學博士 淡江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教授
黃斐章 文學碩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黎惟東 國家哲學博士 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薛雷 文化大學英文系教授
蘇雅如 美國密蘇里大學文學碩士 東吳大學英文系講師
羅茂彬 文化大學英文系教授
Madison Morrison 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教授
Jonathan Jordahl 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 曾任韓國慶南大學副教授

第一章

上海，這個在中國十多億人口中擁有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城市，我們置身其中，被一羣羣衣著及表情一成不變的行人及腳踏車騎士所淹沒。突然一個新的念頭閃過我腦中，如果從現在開始，德國的人口突然增加二倍，而中國的人口却減至八百萬，會有什麼事發生？接著腦海中浮出一幅，一億撒克遜及玆瓦本移民向世界拋售他們過剩的勤勉的圖畫。

穿梭於這腳踏車陣中，我們爲這念頭感到恐懼。這可能嗎？這可行嗎？能否想像將有十多億的德國人居住在地球上，而其現在的人口增加率不到百分之一點二，到西元二千年時，却要它增加二億人口。世界能忍受這種事情嗎？會不會起而防衛以抵抗這麼龐大的羣衆（但用何種方法？）或者是這世界也能像包容如此多的中國人一樣的包容德

國人（包括撒克遜人及茲瓦本人）？

有什麼像樣的理由讓德國做如此大量的增殖？德國人將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贏得怎麼樣的最後勝利，才能夠繁殖到如此可怕的地步？是藉由將所有的日耳曼人歸化成德國人、推行德國化運動、祖國崇拜運動、及由國家來養育德國的下一代的這些政策而達成的嗎？

爲了避免陷入更進一步的推理，我安慰自己道：「就像中國人，儘管發生過革命大串聯，仍以其傳統的官僚制度治理著中國十億老百姓一般，德國只要恢復普魯士傳統，也有可能治理好十億德國人。」

此時，我及伍得因爲來來往往的腳踏車而被迫返回現實（我正幻想著：在大多數德國腳踏車騎士中，我是位永遠的佇足者。此時，突然閃過一輛腳踏車，還好我們即時警覺）。我們很慶幸能安然穿過那條交通擁擠的馬路及令人不舒服的種種現象。但一個月後，當我們結束旅程從中國大陸搭機經新加坡、馬尼拉、開羅、返回柏林，愈接近德國，愈感到重返現實生活的壓力。

基督教反對派曾攻擊政府不讓德國人做適度增殖的政策，並曾爲增殖率的多少與政

府爭辯。據他們宣稱，人口成長的步調已停滯，而這都怪自由民主黨的處置不當，致使德國遭受滅亡的威脅。如果連外國人算進去，德國的人口總數約可達六千萬人——雖然這是十分可恥而惟一可行之路；如果不將外國人算進去，可預期的是，德國民族將加速老朽以至滅亡。相反地，中國民族將以天文數字增加，甚至到西元二千年時的人口總數，也曾有人做過預估。

正當衆議院爲減少德國人口而爭辯不休之時，幾位中國高階層官員的來訪更增加了反對減少德國人口者的恐懼。由於德國人對恐懼的感染力高過中國人，政治家就可藉此推銷他對如何克服恐懼的一套政綱。

德國人將逐漸滅亡，其居住地將變爲一片荒蕪，這種想法可能嗎？世人能接受嗎？世界上若沒有德國人的存在，會不會有什麼改變？世人將尋求中國人的拯救嗎？其他國家的人將發現東西缺少鹽嗎？少了我們，對這世界有何意義？是否新一代的德國人將被迫創造出來，包括撒克遜人及茲瓦本人？以後回顧歷史是否更能理解德國爲何滅亡，因爲德國的種種將被放在玻璃櫥窗中展示，至少德國人得到了安歇？

另一個問題是，德國滅亡，此一跨躍歷史的奇觀，是否只能成爲新興國家研究的一

項課題？由於此項想法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可能，我將它列爲一項主題，是否出書或拍成電影尚是未知數，無論出書或拍成電影，其標題將是「頭生」。這標題源自希臘神話，由於智慧女神雅典娜自宙斯神的頭部誕生，因之稱爲「頭生」，一項至今已深印男人腦中的似是而非的觀念。

我還有另一主題放在行李箱中，是一份十四頁手稿的論文，英文名爲「德國文學」，其副標題可爲「德國文學之概念」。我打算在上海、北京及其他地方發表演說如下：「到目前爲止，文學是唯一能代表整個德國（東西德）的東西，雖然有柏林圍牆這道障礙但並未因而停止交流。這項事實是德國人不想也不被允許知道的。由於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經濟上及軍事上，東西德間彼此互相抗衡，致使他們無法認清東德與西德原本就是一個完整的國家，是由兩個政府所組成的一個國家。僅以物質觀點來看，西德政府表現得十分生氣盎然，而東德政府則顯得暮氣沈沈，因爲如此，德國連想成爲一個文化大國的這種可能性都落空了。物質主義及共產主義就是他們所能想到的全部。他們只是喜歡比較價錢而已！

只是最近，出生率失去平衡，可貴的石油又不再自由生產，人們於是開始尋找積極

的生活內涵，想用其他的寄託以填補物質上的空虛。德國人找尋精神上的價值，稱其爲基本價值，但並不包括精神的提昇。這些基本價值含蓋著如：對神學觀念之澄清，及每天在市集上都可見到闡釋耶穌基督的新觀念編寫成冊出售著。文化就在其中，閱讀、展覽的活動進行的非常熱烈。每年都有固定的戲劇節活動，及音樂季活動。如同即將溺斃之人，市民緊抓著書本這塊浮木不放。作家比東德的警察、西德的民意測驗專家還來得受歡迎，這現象使敏感的詩人害怕。

以下我打算簡單說明德國進步遲緩的戰後文學是多麼的粗鄙率直、貧乏淺薄。在北京，對著九億五千萬人口中的二百名北平人，我說：「一九四五那一年，德國不只是軍事上的戰敗、城市工廠的被毀，最糟的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已破壞德國語言的意義，使整個文字系統變得有如廢物一般。如此分化的語言，作家也身受其害，他們感到無所適從。因此在二位難民文學的巨擘——湯姆斯曼及布雷希特的面前，他們只會顯得結巴。」

此時，一小羣中國人聚在一起並說：「這正是我們目前的狀況，四人幫——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欺騙了我們十年，害我們一無所知又變得愚蠢。一切事物，甚至古典文

學都在禁止之列，語言也被破壞。現在有些作家小心地開始描寫現狀——如你所說，畏縮縮的——他們寫過去曾被禁止過的主題，諸如愛情等。當然在措辭上不十分自然。對這方面我們仍限制的很嚴。直到最近，結婚的限制才放寬。當然，政府有他的理由：爲了解決人口問題。我們人真多，不是嗎？但是只有已婚夫婦才能分配到避孕丸。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寫過有關年輕人苦悶的書，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地方可以談情說愛。」

說這話之人，三十開外，穿著標準的藍色制服。他在文化大革命時學過德語，由於教科書得之不易，他必須在書本外包上一張書名爲「意識論」的書皮來做偽裝，因爲意識論在當時是一本很平常的書。四人幫垮臺後，他被允許在海德堡待了一年，因此他的德語說的很道地，他說：「我們這一代都被愚弄了。」他現在在教書，並想繼續深造。他還說：「現在上課時間多了，每週有三十八小時。」

這對教師夫婦——我頭生的主角——來自好斯頓的易茲豪（位於沼澤地和灌木叢地之間），一個人口逐漸減少，文明侵蝕逐漸增加的都市。丈夫已是中年，妻子三十出頭，他出生於海德馬根（Hademarschen），母親仍住在那兒。她出生於克倫坡（

Krempel)，雙親賣掉農地後已經退休。兩人年輕時皆是學生抗議運動中的中堅份子。他們可能是在基爾一次反越戰靜坐示威中相遇，也可能是在漢堡或柏林。十年前他們曾試圖消滅那些破壞德國文化的事物。他們所參加的反抗運動是有所目標的。文化革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著，接著，他們很順利的完成教師訓練課程，各自與別人談過幾次戀愛，最後兩人決定結婚，沒有牧師證婚，只有雙方家人參加。

那已是七年前的事了。婚後，他們在州立學校教過四、五年的書。二人都通過第一次及第二次由國家所舉辦的鑑定考試。夫妻間的感情十分平穩，是一對典型的模範夫婦，彷彿與圖畫書中的人物是同一模子印出來的。他們沒有小孩，只養了一隻貓。

他們並非不能生育，而是當她終於決定要懷孕時，他丈夫尚未準備好；而她丈夫準備好時，她却又反對。她說：「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對我則行不通，至少現在不行。我們應採取負責客觀的態度。想想你將讓自己的孩子面對什麼樣的未來，什麼樣的遠景？更何況這世上已有太多的小孩。看看分佈於印度、墨西哥、埃及、及中國的小孩吧！再看看統計數字吧！」

他們皆教外文——他教英文，她教法文——在查理曼皇家學院（簡稱KKS）任

教。地理是他們教的第二科目。查理曼皇家學院命名的由來，是因為在第九世紀查理曼帝國時代，查理曼大帝曾派遣一支載送犯人的遠征隊到好斯頓，中途被阻於接近現今易茲豪斯層的地方。因為特別喜歡教地理，他們對河流、羣山、礦層、土壤、化學及人口數字，皆有豐富的常識。他時常引述馬克斯的理論：資本家的盈餘皆來自剩餘價值。她則反覆地提出資料，統計圖表，電腦模擬設計以證明她的論點：「瞧！南非這兒的人口出生率每年都以百分之三成長，墨西哥更高達百分之五，即使有任何進步的成果，也都被過多的人口吃掉了，而教宗這個白癡仍反對人們使用避孕丸。」

她經常服用避孕丸，通常是在第一堂課開始之前。一項用來證明，她經過理智分析後的自我克制情慾的奇怪方法。這會兒，頭生這部戲就要開鑼了：攝影機用長鏡頭拍攝著印度，突然，她上半身出現在鏡頭中，背後是半個孟加拉灣，加爾各答及孟加拉做背景。無意中，她吞下一顆避孕丸，蓋上一本書並說：「印度政府用控制出生作為家庭計畫的方法，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它必失敗。」

接著，讓我們跳出螢幕。此時她可能正問著全班有關印度比哈省、聯合省之人口數字及其人口過剩的問題，於是印度的不幸化成一堆數字讓人討論著。印度之未來也成了

研究的課題。

這正可說明我對福克·史龍多爾夫所說的話：「我們應該選擇印度、爪哇或中國大陸（如果中共允許的話）來拍攝這部電影。」福克是我和馬加里·范特洛特在雅加達認識的朋友，之後又曾在開羅碰過面。

我的構想是讓這對教師夫婦做一趟旅行，照著我、馬德、福克及馬加里所曾做過的依樣畫葫蘆。他們將像我們一樣，站在陌生的環境中，一邊感到汗流浹背，一邊比較眼見的事實與統計數字之間的差異。噴射機劃過長空，一下子，他們從易茲豪到了孟買。飛機誤點；手提行李中有略為翻過的導遊手冊；腦中有對印度先入為主的印象；一連串的預防接種。他們懷著新生成的傲慢而來，却說：「我們是來學習的。」

在人潮洶湧的孟買市中心，他們敏銳地嗅出恐懼的氣息（正如我在上海），也因此可能會做一番推測，假設這世上，德國人口將取代印度而有七億人。但這中間數字並不對我的胃口。對一個德國人來說，七億人口在理論上尚不夠多。德國人要不就滅亡，要不就增殖至十億人口。

我們和史龍多爾夫是代表歌德海外文化部到東方做宣傳旅行，（編者：歌德海外

文化部曾贊助格拉斯及電影錫鼓的導演史龍多爾夫到印度、中國大陸做演說及讀書旅行。儘管行程安排很緊，工作還蠻單純的。旅行結束後，必需完成一部電影，我則要提出讀書報告。我們的教師夫婦，爲了想在這趟旅行中搜集一些資料，他們與一家旅行社簽約。那家旅行社的旅遊指南上，曾保證他們會有一趟真實的東方之旅。我已了解歌德海外文化部的運作情形，剩下的工作就是去營造那家想像中的旅行社（及其破碎的行程安排）。一方面，我們依靠歌德海外文化部主管的指引；另一方面，教師夫婦將跟隨一位已付過款的導遊的帶領，那位導遊無所不知：包括那兒可買到峇里島木雕小像或爪哇木，小像是尊多頭神像，頭側向一旁的姿態是印度神像的典型——是的。當地有名的食物是什麼？該給黃包車夫多少小費？這些那名導遊全都知道。這對教師夫婦還僱用了一位當地人，帶他們參觀部分的貧民窟，那兒的居民並不拒絕被人拍照。

這兒不須浪費筆墨描寫歌德海外文化部的主管及他們個人的狂熱。至於我們僱用的導遊，可以這麼形容他：有著一張已老的娃娃臉，他深邃的目光總透露著智慧，臉上戴著鑲有神像的鎧邊眼睛，對每件事總有正反兩種意見。他曾對我們打算要拍的印度文明做過一番研究。

德國人看事情也總是有正反兩種看法，如一方面，核能工廠代表著不可估計的危險，另一方面，只有新科技才能保證我們已習慣的生活水準不致低落；再如一方面，人力耕耘提供了八億中國人的食物及工作機會，另一方面，只有機器耕耘才能提高每畝農田的產量。因此，中國若採機械耕耘，將有半數農民失業，而這些多餘人力就會從事其他工作。

教師夫婦來自接近布魯克多夫的易茲豪。無論從政治、個人、或一般的角度來看，都十分適合中歐此種「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客廳遊戲。她屬於FDP（自由民主黨），他則屬於SPD（社會民主黨）。他曾在社會民主黨的集會中演說有關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題目。二人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一方面，環境學家保護環境的主張是對的；另一方面，人民却讓史特勞斯當選。」

生活中總有些事讓他們感到很難忍受。他後悔自己做事沒有長程的遠見，她則後悔自己做事沒有方法。她感到情緒低落，他則意氣消沈。她抱怨她父親將農地賣給雞蛋工場，他則希望他母親搬來公寓與他們一起住。他母親目前一個人住在海德馬森，但由於他認為自己十分懂事，所以他想替母親就近找一處經營良好的養老院。基本上，她願意